

实践智慧

马克思“实践智慧”的

MAKESI SHIJIANZHUIHUI DE
DANGDAI CHANSHI

当代阐释

牛小侠 / 著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实践智慧”的

MAKESI SHIJIANZHUI DE
DANGDAI CHANSHI

当代阐释

牛小侠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当代阐释/牛小侠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01-019400-4

I. ①马… II. ①牛…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7451 号

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当代阐释

MAKESI SHIJIANZHUI DE DANGDAI CHANSHI

牛小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198 千字

ISBN 978-7-01-019400-4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牛小侠博士《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当代阐释》这部著作是继她《当代“有限性”视阈下的马克思哲学旨趣研究——理解马克思哲学“形而上”的一种维度》著作之后又一部新作，在此衷心祝贺！

大致阅读本书，本书特征以学理见长，从学理深处挖掘实践智慧的历史变迁，论证了实践智慧是人类社会解答自身存在之谜的一种理论思考和实践结果。对这一学科的界定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解答世界第一原理的理论智慧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哲学或形而上学，解答人间智慧的哲学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实践智慧，主要体现在人间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活动与秩序的安排上。作者通过对古希腊哲学一直到马克思实践哲学这一历史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实践智慧内涵的演变过程。自从亚里士多德把实践智慧界定为政治学和伦理学之后，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内在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在古希腊，政治学和伦理学都被称为实践智慧，但政治学价值取向在一定意义上是趋向于伦理学的价值目标的，都是为城邦社会伦理秩序服务的，当上帝的教义作为一种神圣世俗规范时，政治学真的演变成了宗教伦理的工具。针对这一现象，近代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从现实主义出发提出了政治无道德，颠倒了中世纪政治和伦理的关系，他以拒绝伦理的方式凸显了政治实践在社会中的作用；康德从本体论意义上重新恢复了实践智慧的道德意蕴，赋予实践智慧神圣崇高的位置；黑格尔哲学以思辨逻辑方式呈现实践智慧的意蕴。与传统

哲学家不同，马克思不仅在政治、伦理视域中阐释了实践智慧，而且首肯了“生产实践智慧”的现实价值，在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上赋予“生产活动”全新的价值，并在“形而上”与“形而下”双重向度中阐释了实践智慧的内涵，实践智慧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创制活动，而且在生产活动中蕴涵一种新的形而上的向度，这种向度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而且也体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取向上，人类实践智慧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上，而且还体现在每个社会形态更替上。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实践智慧的结果，只不过这种实践智慧是通过一种异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即实践智慧以异化方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异化的实践智慧，指出了这种实践智慧的伦理向度和政治向度的局限性，以全人类的伦理视野和政治视野来解答真正的实践智慧，这应当是符合人性发展的社会伦理和政治活动，它在整体社会视域中变革了传统实践智慧，使实践智慧既具有“形而下”生产的现实活动，又具有“形而上”指向的人类社会解放过程。

作者不仅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阐释了实践智慧的历史渊源，而且从“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双层向度阐释了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内涵及其社会历史变革的意义。马克思在现实意义上恢复了实践智慧的伦理向度，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就是劳动，最基本的劳动形式就是物质生产这一劳动形式。马克思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肯定了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伦理价值，认为它是人类历史第一前提，没有物质生产活动，人类将无法进行分配、交往和消费等活动，即没有物质生产活动，人类将无法进行生活。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阐释了物质生产活动符合社会伦理和人伦的需要。马克思在阐释物质生产活动社会伦理意义的同时，也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使得人的物质生产成为一种合理的符合人发展需要的社会生产。为解答此问题，马克思从社会经济最基本的单位——商品出发，分析了商品的两种属性，揭示了商品形而上学的面纱：商品不再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一种使用价值，它

的更大价值在于它是能够带来利润的资本，它充当资本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和中介，但现实社会的人生活在对资本依赖基础上、人的独立基础上，确切地说，人生活在资本异化和统治之下，人受商品资本的统治和支配，这种人与物颠倒的物化社会是一种不正义的社会。为揭露这种不正义的社会根源，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人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这种异化现象，包括人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在于财产私人所有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前提即财产私人所有制，这种财产私人所有制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财产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这种矛盾达到极致时，代表新的生产力的社会生产关系将产生，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言的，它具有伦理向度“形而上”的价值指向，对于现实的人类来说，这种伦理向度“形而上”价值指向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地牵引着当代社会向前发展。作者不仅分析了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双重内涵，在此基础上还阐释了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分类，作为理论层面的实践智慧、政治层面的实践智慧和求实精神实证层面的实践智慧，表明了马克思实践智慧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多种实现方式，也展现了马克思实践智慧是一个具有完整内涵的实践智慧，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实践智慧的内涵，使实践智慧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贯彻，不再仅仅局限在伦理和政治这两个领域之中，而是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实现，在马克思实践智慧内涵与其分类过程中彰显了马克思实践智慧的特征，即现实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历史性与超越性的统一，由此可知，作者全方位阐释了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内涵、分类和特征。

作者站在马克思实践智慧“形而上”与“形而下”双重向度的立

场，对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视域和向度来阐释马克思“实践智慧”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主要审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技术化”的反思与追问，集中体现在对马尔库塞对实践技术化批判的审视、对海德格尔对生存论实践智慧建构的审视和对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实践意蕴阐释的审视。虽然马尔库塞从技术造成人的思维单向度上批判现代技术缺失“智慧”意蕴，但他并没有揭示技术造成人单向度思维方式的社会根源，更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超越国家界限以变革整个社会；虽然海德格尔从人的生存论层面建构人的实践智慧，以克服技术座架造成现代人实践智慧丧失的弊端，但他克服这种弊端的方式或路径是非现实性的，因此在实践智慧意义上无法真正的达到；虽然卢卡奇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理论”进行了批判，但他从“总体性”逻辑阐释物化理论并没有完整地把握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精髓。马克思实践智慧不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理论进行批判，而且在对资本主义物化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要对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异化以及造成这种异化的社会根源进行批判。除此之外，作者还阐释了米哈拉夫·马尔科维奇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作者针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是否具有社会伦理的争议进行探讨，分析了艾伦·布坎南从法权内外质疑马克思社会伦理思想的观点。艾伦·布坎南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使用社会伦理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法权内的社会正义，如果跳越资本主义社会即用资本主义法权外的伦理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超历史性的做法。针对这些问题作者认为，艾伦·布坎南是立足资本主义社会法权内的社会伦理思想来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伦理思想，虽然马克思没有运用伦理学的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但当马克思使用了“异化”、“剥削”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冰冷的金钱关系等话语时，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在伦理道德意义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合理性，在此意义上作者赞同了凯·尼尔森从马克思社会伦理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虽然作者赞同了凯·尼尔森

的某些观点，但她还是立足在马克思整体社会伦理观的基础上，对凯·尼尔森把握马克思某些观点不够深入之处进行了批判。

作者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进行分析之后，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进行了分析，对当代中国学界“劳动”实践本体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对实践“本体论”庸俗化的理解进行了审视。在批判的过程中，作者基于中国现实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实践智慧”的践行，主要表现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毛泽东的实践智慧；推动民族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的实践智慧；促进民族繁荣富强与社会主义崛起的新时代党的实践智慧。总而言之，作者以她深厚的学理知识全面深刻阐释了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内涵、特征及其对现当代学界产生的深刻影响和价值，论证了马克思实践智慧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发展和运用，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也表明，作者以全面整体的思维方式把握了马克思实践智慧，科学合理地阐释了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陆杰荣

2017年9月于沈阳

目 录

绪 论	1
一、人类生活方式的选择——实践智慧	1
二、“实践智慧”的主旨——以理论、实践方式增进人类 幸福生活	11
三、需要澄清的问题——实践哲学与实践智慧之别	17
四、研究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当代意义	25
（一）拓展了对“实践智慧”内涵的当代理解	25
（二）深化了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精神的理解	29
（三）加深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践智慧的理解	34
第一章 “实践智慧”的历史溯源与演进	39
一、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的界定	40
二、康德对道德实践本体论的承诺	49
三、黑格尔思辨哲学中实践精神的本质	63
第二章 马克思“实践智慧”内涵的确立及双层维度	75
一、马克思实践智慧内涵的确立	75
（一）“生产性”实践智慧的凸显	75
（二）“生产之技术化”实践智慧的批判	78
二、马克思实践智慧内涵的双层维度	80

(一) 马克思实践智慧“形而下”的维度	86
(二) 马克思实践智慧“形而上”的维度	92
(三) 马克思实践智慧“双层维度”的辩证精神	101
第三章 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分类与特征	104
一、马克思实践智慧的分类	104
(一) 理论层面的实践智慧	105
(二) 社会求实层面的实践智慧	112
(三) 政治层面的实践智慧	116
二、马克思实践智慧呈现的特征	119
(一) 现实性与批判性的统一	119
(二) 历史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128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智慧”的现当代反思与追问	133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技术化”的现当代反思与 追问	134
(一) 马尔库塞对实践技术化的批判	136
(二) 海德格尔生存论实践智慧的建构	141
(三) 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实践意蕴的阐释	150
(四) 米哈拉夫·马尔科维奇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继承 和发展	153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是否具有社会伦理 的争议	160
(一) 艾伦·布坎南从法权内外质疑马克思社会伦理 思想	160
(二) 凯·尼尔森从马克思社会伦理角度批判资本主义 社会	168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智慧（实践哲学）研究的 当代审视	174

(一) “劳动”实践本体论的反思	176
(二) 实践“本体论”庸俗化的审视	182
第五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实践智慧”的践行	190
一、毛泽东的实践智慧——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 建立	190
二、邓小平的实践智慧——民族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构	198
三、新时代党的实践智慧——民族繁荣富强与社会主义 的崛起	203
参考文献	208
后 记	217

绪 论

一、人类生活方式的选择——实践智慧

纵观古今，人类生活世界一直在不断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人类生活“向善”目的为追求，至于这个“善”是什么？不同历史时期的哲人给予不同的解释和回答。古代自然哲学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即为“善”，因为在古人看来，自然不论在力量上还是地位上都略胜于人类自身，因此，他们祈求在自然界中找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在此意义上，古人由力图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人类自身根基的想法转向了对自然界的思考，寻求本原或人类生活伦理纲常的依据被界定在外部自然界了。所以，西方古人把“水”、“火”或“气”、“原子”等等作为世界的本原也不足为奇了；中国古代仁义礼智信发展到汉朝时，这些伦理纲常与天空中的“五行”相关联，并要求“以德配天”，即按照自然界的“命数”来规范人类世界的“命数”。深究之，无论寻求本原还是要求“以德配天”，都表达了人类生活方式的诉求，人怎样研究并确定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表明了人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古人以自然界的某物作为世界的本原，必然对某物充满了崇拜和敬畏，“万物有灵”的思想以及古代人神话生活方式都是世界本原追求的结果，人的生活方式也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

的；从现代人的视野来看，神话的生活方式虽是不科学的，但它确实表征了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目的在于人类能够按照某种“逻各斯”过上安宁的稳定生活，从而消除来源于对外界力量的敬畏和人类内心世界中的恐惧和不安，古人神话似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其目的在于解除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从而过上内心安宁幸福的生活。

如果说古代人为了内心安宁而寻求外在世界的根基以满足内心需求的话，那么近代人则直接把“意识内的自我”作为获得外在世界存在的根基，这样一来，意识内的存在和外在世界的存在在认识中就达到了直接的统一。近代人不再在外在世界中寻求安身立命之本，而是在“自我意识”中寻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本，从而解答了世界存在的合法性，即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与外在世界的存在在人的认识中得到审视才具有某种的一致性，正是由于“自我意识”的存在与“外在世界”的存在之间的统一要经过认识才能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学界把近代哲学称为“认识论”转型。在这里，关键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经验论认为通过经验，唯理论认为通过思维，两者孰是孰非近代哲学展开了争论，形成了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不论哪一种方式，都是在思维中以获得正确的“知识”作为基础的，所以什么样的“知识”是正确的就解答了认识论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认识论是解答“思想”或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哪种获得知识的方式是正确的呢？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是正确的，还是思维中某种潜在的知识是正确的呢？为此近代哲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结果经验论和唯理论都走向了一个“怪圈”，那就是都走向了“不可知论”，因为经验论无法知晓经验之外的存在是否存在的问题，更无法以知识的方式加以回答；唯理论以先验的方式获得知识，就知识的来源而言，它走向了神秘的不可知论。这两种不可知论在休谟哲学和莱布尼茨哲学中能够得到确切证明，休谟以经验对理性的僭越而确立了经验的不可知论，莱布尼茨以“单子预定和谐论”证明了知识的神秘性。无论哪一种不可知论，都证明

了这些确证知识方式的不可靠性。为解决此问题，康德进行了尝试，他从先验论出发，确定了自然界知识的有限性，即证明了知识只能是现象世界的知识，不可能是“形而上学”的知识。“康德认为知识就是判断，并对传统知识内容进行了考察和细致分析，传统知识要么是分析判断，要么是综合判断，无论它们来源及其逻辑形式如何，‘它们或者仅仅是解释性的，对知识的内容毫无增加；或者是扩展性的，对已有的知识有所增加。’”^①真正的知识应当是“先天综合判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知识的正确性，为此，他确立了自然科学知识成立的条件：人的理性先天条件和外界杂乱无章经验材料的综合。在此，康德只想证明知识在人的有限理性面前的“有限性”，进而为其信仰留下余地，因为人的理性不仅具有有限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无限性的一面，即形而上学的倾向，这一倾向在传统哲学中总是以知识的方式来解决的，所以人的形而上的生活方式总是受形而下的生活方式的干扰，这一困境的解决在康德看来，在于用信仰的方式而不是用知识的方式来解答形而上学的问题，康德这一解答方式从学理说是非常深入的，但他并没有彻底地解决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关系问题，恰恰相反，他却陷入了这一分裂之中，这就是康德哲学困境，同时也表明了近代哲学困境，更表明了近代人分裂的生活方式，即经验生活和理性生活、形而下的生活与形而上的生活、世俗生活与信仰生活的分离。从整体价值取向来说，近代哲人总是以理性生活、形而上的生活、信仰生活统治着经验生活、形而下的生活和世俗生活，这也反射出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寻求的基调。

纵向观之，近代人仍然在寻求着生活方式的根据，只是这种行为从古人对外在世界的寻求转向了对内在自我意识或思维方式的寻求，这也标志着近代人类思维水平的提升，哲学界将其称为“人类意识真正的

① 牛小侠：《当代“有限性”视阈下的马克思哲学旨趣研究——理解马克思哲学“形而上”的一种维度》，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觉醒”，正是这一觉醒，“意识内的自我”才能作为外在世界合法性的根据。黑格尔哲学的开端正好表明了“意识内的自我”的基础性和不证自明性，不过它把“自我意识”包装为“实体性”的存在，进而说明“自我意识”存在的客观性，正是“自我意识”主体性和客观性的统一，“自我意识”才能以“绝对精神”普遍性的形式存在着和发展着。在思维逻辑上，“绝对精神”自我设定自己，从而回归到自身，这种运动过程丰富了绝对精神的内容，但“绝对精神”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其普遍性形式永远统治着不断变化的内容，所以内容总是“变体”，正是由于它是“变体”，所以它才作为一个一个“定在”存在，“定在”的暂时性存在或等待着被新的“定在”否定，这本身就体现了“绝对精神”的内容易变性和丰富多彩性，唯一不变的就是“普遍性形式”。就这一点而言，它是亚里士多德“实体”普遍性和斯宾诺莎“实体”自因在逻辑上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表达了近代人祈求提升精神层次的生活方式的追求。黑格尔于1816年在海德堡大学演讲时就表达了提高当时人精神生活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时代的艰辛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事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① 为了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黑格尔回归传统哲学，认为哲学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史，“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① 这表明我们现在也应当注重人的精神，因为“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的结合着的。”^② 为此黑格尔把历史的开端视为是人类精神性的活动，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就展示了人类精神发展的历程，从黑格尔的现实意图来说，他是关注现实人的生活现状的，只是把人的生活现状归结为精神生活的遗失，从而提高现实人的精神生活，为此他把哲学史视为是一种人类精神或思想的历史，同时把这种精神历程或思想历程延伸到“现代社会”（黑格尔生活时代）。因此，黑格尔从现实人的生活方式出发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追求具有现实指向，但解决的途径则是非现实性的，因为人类生活方式首先应当建立在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绝对精神”之上，这一点马克思哲学给予深刻的解答。

虽然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也探讨历史，但对历史的理解有着本质的不同。如前所述，黑格尔把历史视为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历史；与此不同，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作为主体人追求目的的创造性活动，首先应当是物质生活的创造，所以马克思哲学首要确定的事实是历史开端——现实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尤其是人的肉体组织的满足，为了满足肉体组织，人必须依赖大自然的给予，当然这种“给予”不是被动的，而是人的主动性活动，是人与自然相互生成的过程。人首先是通过实践的方式从大自然中索取自身需求的东西，在此意义上，“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

②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8页。

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① 人的这种主体欲望和被限制的欲望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实现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不至于死亡维持人的肉体组织的生命之源，这种生命之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是受到自然界本身和特定历史条件限制的，由于特定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局限性，这些决定了人类怎样面向自然、开发自然资源，这也决定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特定性和差异性，根据人类生活方式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学。

人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方式以及特定的人类生活方式都是通过实践方式取得的，根据实践经验人类可以总结和设计自身的社会存在样式，这就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实践智慧”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人类实践智慧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从哲学史的角度进行划分的话，黑格尔哲学以前的西方哲学史集中的以“理性力量”的方式体现了人类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以“理性启蒙”、“理性自觉”、“理性信仰”的方式践行着，正如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② 人类这一理性实践智慧不仅体现了人类思维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则表达了人类以自身“理性智慧”引导人类自身发展，这是一种人类社会建构史上无法遗忘的伟绩，人类为什么以“理性智慧”的方式来建构其生活其中的社会呢？主要的原因在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追问的结果，或者说，在那个时代人类看待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② 江怡：《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